

北方的原野,秋季五颜六色,最为夺目的金黄色,汝水两岸的玉米、花生、大豆、高粱都闪烁着光芒,耀人眼目,渐次步入了收获时节。农人少闲,此时更为忙碌,处处洋溢着岁月如水的平静,还有隐隐约约的莫名兴奋。此时,靠近汝水与沙河汇流处河湾一隅的无名水塘也跃跃欲试起来。这一水塘静养了一年多的鱼儿也要出水面奔向四方去了。鱼儿成熟出水,已经远非当年的驾一小舟,撒网捕鱼,居然用上了桥梁工地之上的摇臂起吊机,阵仗很是壮观呢。

汝水边的这一水塘,说不上壮阔浩渺,浮光跃金,甚至可以说是简陋平常,近乎荒芜一片,也就是随形就势,简单围堰,引入汝水,成一大一小两个子母水塘。水塘边,有一简易平板房,堆放养鱼饲料等,也供养鱼人在此偶尔歇身,稍作休息,或聊避风雨,遮阳乘凉。围绕这一方水塘,有些鸡、鸭、鹅、羊等,碧草杂树,河水潺潺,自由散养,无拘无束。最为费心劳神的,自然是水塘里的鱼儿。鱼苗运道而来至汝水安身,颇费一番周折呢。这些鱼苗,或从浙江湖州而来,或从湖北襄阳而至,千里迢迢,少小离家,起初还很不适应此地环境,情绪黯然。过些时日,方才不再想家,在此开启新的生活。但鱼儿到此,适应这一方水土,要想茁壮成长一路坦途,也并不太容易呢。有水鸟经常来骚扰,有习焉不察的虫害来进

车声碌碌满鱼塘

王振羽



有不少鱼儿就此夭折了。鱼塘还要经常清扫,保持水质,水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不能至清,也不能放任自流。氧气缺乏不行,氧气过多,也是麻烦。养鱼的大哥说,陆游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真是一点儿不错,平时只是看人钓鱼潇洒吃鱼痛快,非躬身养鱼,哪里知道这其中还有如此之多的幽微与曲折?鱼儿成长,不能指望速成,也不能仅凭老经验靠天收,细节决定成败,每一步都不能大意。此间甘苦,唯有自知。出鱼了。鱼贩前来,查看鱼的斤两体重,张网来捕,锱铢必较。这网,不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渔网,也不是《海岛女民兵》中的海网,是机械控制的一种拉网,有点儿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的意思。声音轰鸣,震耳欲聋,长臂摆动,直接装车,一条龙作业,很快就能完成。但是,问题来了,这样的大动干戈,这样的动众兴师,鱼贩们对鱼的大小是很在意的,不符合要求的鱼儿就被无情地淘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一番鱼跃水面惊动恐慌,这一番生死离别惨戚感,鱼塘里的鱼儿被打破了平常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不淡定了,不优哉游哉了,情绪波动很大,还有点儿近乎失控的状态。这一场出鱼之后,剩下的鱼儿几乎要绝食了,几天不吃不喝,照旧按时喂鱼,鱼儿几无动静,脾气很大嘛。大哥说,这样不行,要改变捕鱼方式,要有点儿人情味儿,把鱼送走,还是讲究一点儿方法的好。于是,又去买来一种网,被称作抬网。东西南北几重围,围形渐缩如小池。这种网,围成四方形,沉于鱼塘之底,待鱼贩前来,再慢慢起网,收拢,舒缓,平静,鱼儿受不到太大惊吓,鱼塘边还播放着一些悦耳的音乐,不是高亢嘹亮的豫剧,而是选择一些苍凉深遂的流行歌曲,如刀郎的《罗刹海市》《花妖》等。就是在这样的氛围情景之中,鱼儿出水了,装车了,沿着汝河大堤就此远去了。

秋水长天,碧空如洗。“风色萧萧生麦陇,车声碌碌满鱼塘。”大哥说,新的鱼苗也要到了,先用小网沉入水塘静养一段时间,让它们先适应一下环境,不能心急,从容而来,又是一个秋去春来的四季了。



沽上丛话

古代诗歌经过历代积累,常有一些在内容、格调、技巧上相近或相反的作品。即便是相近,也有不同之处,选来对读,能练眼光、长思致、明原理。把诗作之间微妙的区别说明白,言人之所能感而不能言者,就更为难得。

例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刘皂的《旅次朔方》和王安石的《州桥》则较生僻。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由李诗而论及刘诗,再及王诗,三者相参,很有眼光。刘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王诗:“州桥路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鸣咽,却看山月话州桥。”沈先生对这三首诗都有精辟的评价,不再逐一复述。这里想说明的,是这三首诗放在一起,很明显的就把王诗比下来,我们在对读的过程中,要看得出高低,说得原因。

李诗设想他年巴山共话,是一种基于时空变换而产生的情感的丰富,刘诗也是情感的加法,但李诗是从现在对未来作设想之辞,而刘诗是写现实之辞;李是站在未来,又反过来对现在做回顾,而刘是当下已经发生情感的转变。

与这两首诗相比,王诗在情感表现上远远不及前二首,情感及其表达都比较薄。

从内容看,它与刘诗较为相近。在刘皂笔下,并州本来是客次,经过十年羁留,现在却成为舍不得离开的“二故乡”,而王安石说当年自己在开封汴河的州桥上踏月时,本来惦记着距金陵不远的钟山,现在晚年退居金陵,回想开封旧游,又在踏月时想念州桥。看似与刘诗雷同,但王诗只是过往和回忆之间的“一来一回”,是一种常见的怀念,没有刘诗那种变换“故乡”的心态转化。

满庭芳

第五二〇二期

汤玉麟旧居位于河北区民主道38号,为天津市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这是一座石基楼,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府邸风格。底层为深宽缝的仿花岗岩砌块,入口大门为圆拱券门。二层中央有三个连拱券门,用类似混合式的柱支撑着。前面是带有瓶饰栏杆的阳台。檐口出檐较大,用檐托支撑,檐壁上局部用了洛可可的雕饰。主楼西侧还有舞厅,造型瑰丽而富有特色,彩色的穹顶使室内的光线五光十色。其院墙嵌白色大理石标志牌一块,上有“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汤玉麟旧宅”等字样。

汤玉麟(1871—1949),字阁臣,原籍山东掖县,生于奉天(今辽宁)阜新。出身绿林,被收编后任奉天巡防营哨官、帮带。1912年后任陆军第二十七师骑兵团团长、第五十三旅旅长。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逃回阜新隐居。1919年又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1921年5月任奉天第一混成旅旅长兼东边镇守使和剿匪司令。1923年任奉天第七混成旅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任第十一师师长。1926年4月任热河都统。1928年东北易帜后,由国民政府任命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六师师长。

据说汤玉麟爱成性,在他豪华的会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猛虎下山图》,他经常坐在铺有虎皮的正座沙发上,加之他剽悍勇猛,武艺过人,专爱与人斗狠,故而人们送他个绰号“汤二虎”。“汤二虎”是张作霖的把兄弟,他勇猛善战,曾被张作霖誉为“忠勇可靠”,为奉系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



扫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从语气看,王诗又与李诗比较近似,但没有李诗情感的丰厚,李诗的情感,用沈祖棻先生的分析来说,是“写出了自己的盼望,也代妻子写出了她所有的盼望。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摆脱了使自己感到寂寞、苦恼或抑郁的环境以及由之产生的这些心情之后,事过境迁,回忆起来,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快的,或者说,是一种掺和着悲哀的愉快……既写出了空间之殊异,又写出了时间之变迁,更重要的和主要的,还从空间时间的相关变化中写出了人的悲欢离合”。而王诗没有李诗这些情感的丰厚,它只是两个地方简单的情感加法,没有情感的复杂和升华,这是读之可感的。

这里简要引伸和补充沈祖棻先生的分析,是想要说明诗的参读,不但要看出相似处,更要看出不同点。再如“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是张籍《秋思》描写发信人情义绵延、言不尽意的名句,白居易《禁中夜作书与元九》诗“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五声宫漏初鸣夜,一点窗灯欲灭时”的前两句与之颇为相似,却比不得张诗更具声息。沈祖棻先生评价说:“这首诗词浅意深,是诗人的一贯风格,但与张诗相比,还不及其自然,所以不及张诗更为人们所喜爱和传诵。”

那么,白诗的字面既已十分浅近,却仍不如张诗自然,这不是造作和自然的区别,而是自然与自然的区别。区别造作和自然尚且要费一番思量,区别自然之间的高下就更需要细腻的诗心。仔细看来,白诗为了抒情,偏偏有一些细腻的描述,所谓“万端”“两纸”“五声”“一点”,都是张诗不具备的。诗人越描摹得细致,勾勒得细,反而显得琐碎,也就越薄。而且这些视听细节的描述,某种程度上分散了抒情的重心,看这听那,就没办法一直锁定那封信,这在抒情的自然上已经输了一筹。

除此之外,“意迟迟”三字的声音表现得很深细,读起来却不够流畅响亮,需要读得漫长,才能见情致,白诗将其放在诗的第二句尾,来不及等等得略久,第三句就出现了。待读到“欲灭时”三字,想漫长也漫长不起来,这就显得前后不协调,腰重脚轻,且腰未能舒展,在表达上又输了一筹。

试将这首诗前后对调一下顺序,成为“五声宫漏初鸣夜,一点窗灯欲灭时。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格律毫无抵触,且由景入情,读到“意迟迟”,声慢调远,余韵不尽,是不是更自然些了呢?白傅有知,定能谅我唐突吧?

他拥护蒋介石,当上了高官。汤玉麟在土改热河期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土地税金每亩就有28种之多,折合大洋一元至数元。另外,还要交纳军粮7.5斤、军草19.5斤。鸦片税由初期的每亩3元大洋增加到12元,最多时达19元,并且一再预征。例如,1931年竟预征到1961年至1971年的。汤玉麟任人唯亲,大儿子汤佐荣为热河省禁烟局局长,二儿子汤佐辅为热河省财政厅厅长,三弟汤玉山当上了58团团长,四弟汤玉铭当上了炮兵旅旅长,五弟汤玉书当上了骑兵旅旅长,侄儿汤福当上了工兵营营长,就连汤玉麟的大舅子夏维士也当上了辎重营营长。热河省俨然成了汤家军的独立王国。电视连续剧《张学良》中,有这样一个情节:20世纪30年代初,热河省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威胁,老百姓饥寒交迫。热河省各县县长难以再从百姓身上榨出油水,收不上来上司索要的苛捐杂

税,因此被他们那个残暴的长官捆绑起来,狠狠毒打,这个长官正是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九一八事变后,热河省数城失陷,面临沦亡的危险,汤玉麟一心想着保全自己的财产。日军逼近热河时,他私扣二百多辆军车,往天津运送私人财产。还没碰上日军的影子,汤玉麟就吓破了胆,连家眷都顾不上带,乘一辆三轮摩托望风而逃。据说,他随身带的400万大洋,慌忙中撒了一地。后来,汤玉麟的部队被宋哲元收编,他自己当了北平军分会高级顾问,自觉没什么意思,半年后辞职,跑到天津当起了寓公。

汤玉麟用他在热河刮地皮得来的钱,买下天津意租界二马路的一处豪宅。这是一座气势宏伟、豪华考究的意大利建筑,外部华丽壮观,楼内装饰极为考究,犹如一座光彩照人的西方官殿。除了这处豪宅之外,意租界医院小马路(今光明道29号)也有他的宅邸,法租界霞飞路的那幢楼

“一招鲜”吃遍天

陈鲁民



拾柴篇

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想立住脚,做出一番事业,就一定要有点儿过人之处,即比一般人强的地方,别人赶不上的地方。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新,人新我变,用百姓俗话说,就是“一招鲜”。

项羽的一招鲜是力拔山兮气盖世,诸葛亮的一招鲜是足智多谋,李广的一招鲜是勇冠三军,李白的一招鲜是斗酒诗百篇,王羲之的一招鲜是笔走龙蛇,曾国藩的一招鲜是屡败屡战,齐白石的一招鲜是画啥像啥,于敏的一招鲜是运筹帷幄,任正非的一招鲜是用人工识人……他们就是靠着各自擅长的一招鲜,书写了人生辉煌。

一招鲜不在多少,有一样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多才多艺,但一样也不精,拿来表演或炫耀可能还有点用处,真到了节骨眼儿上,那可就抓瞎了。在一个高楼林立的地带,每座楼房都安有避雷针,但在一定范围内真正能起到避雷作用的,是其中最高的那根避雷针。如用来比喻一个人,那“最高的避雷针”就是指他的一招鲜。有的演员号称“四栖明星”,能演戏、会唱歌、能主持,还能当模特,结果哪一项都不拔尖,出道多年,仍红不起来,其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一根“最高的避雷针”。可见,一个人不论干什么,要想获得成功,就一定要有一招鲜,即全力把那根“最高的避雷针”做得越高越好。至于其他方面,若兼顾不到,就要毅然放弃,有所不为。

一招鲜有靠天赋的,如天生神力,天生聪慧,天生丽质,等等;但更多还是靠后天努力练成的,这个要更可靠,也最实用。加拿大作家麦尔坎·葛拉威尔在《异数》一书中指出:“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这就叫“一万小时效应”。一万小时是什么概念?是每天练习三小时,风雨无阻,连续练十年的总量。大量研究数据表明,不论任何行业,当你具备基本技能后,最终能否出类拔萃,成为专家、权威,只有一个因素最重要,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最低限度是一万小时。那些独当一面的大国工匠,那些力挽狂澜的技术牛人,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一招鲜不在大小,关键是要有用,要实惠。古时有人花重金,费时日,练成屠龙之技,确实是“过人之技”,名气很大,但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成为世人笑柄。唐朝名将薛仁贵练就弓箭神射手,阵前箭无虚发,令敌军丧胆,大获全胜,被誉为“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这样的一招鲜看似不起眼,但就是能用得上,能管事,有一个一招半式就能打开局面,解决问题。今日而言,一招鲜,不是比别入略强一点儿,稍好一点儿,而是要明显地高出一头,多出一块,与一般人不是一个层次,一个量级。人就怕处处都平庸无奇,事事提不起来,啥技能都不过硬,上不了台面,成不了气候,换不来面包,挣不来荣誉,那就很难有出头之日。

扶轮公学,该校利用铁路运输之便运来青石料盖校舍,这是天津市内第一座用石料建的楼,故而吴深知建石楼之益,在他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及交通总长时,也以其掌管铁路的有利条件,从山地运来石料,购地盖楼,于是才有了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豪华宅邸。吴毓麟在这里居住了近十年的时间。1931年他租赁了特一区12号路的一所德式洋楼,此宅才归汤玉麟所有。

这幢建筑于是便成为汤玉麟晚年隐居天津的寓所。1949年2月,汤玉麟去世。汤妾及其子女于1950年4月将此宅邸卖给天津市供销合作社,现由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使用。这座宅邸是目前天津市保存较为完好的意大利古典式建筑,已被列为天津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汤玉麟旧居:完美的意大利古典式建筑



小楼春秋 [64]

章用秀



他拥护蒋介石,当上了高官。汤玉麟在土改热河期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土地税金每亩就有28种之多,折合大洋一元至数元。另外,还要交纳军粮7.5斤、军草19.5斤。鸦片税由初期的每亩3元大洋增加到12元,最多时达19元,并且一再预征。例如,1931年竟预征到1961年至1971年的。汤玉麟任人唯亲,大儿子汤佐荣为热河省禁烟局局长,二儿子汤佐辅为热河省财政厅厅长,三弟汤玉山当上了58团团长,四弟汤玉铭当上了炮兵旅旅长,五弟汤玉书当上了骑兵旅旅长,侄儿汤福当上了工兵营营长,就连汤玉麟的大舅子夏维士也当上了辎重营营长。热河省俨然成了汤家军的独立王国。电视连续剧《张学良》中,有这样一个情节:20世纪30年代初,热河省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威胁,老百姓饥寒交迫。热河省各县县长难以再从百姓身上榨出油水,收不上来上司索要的苛捐杂

税,因此被他们那个残暴的长官捆绑起来,狠狠毒打,这个长官正是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九一八事变后,热河省数城失陷,面临沦亡的危险,汤玉麟一心想着保全自己的财产。日军逼近热河时,他私扣二百多辆军车,往天津运送私人财产。还没碰上日军的影子,汤玉麟就吓破了胆,连家眷都顾不上带,乘一辆三轮摩托望风而逃。据说,他随身带的400万大洋,慌忙中撒了一地。后来,汤玉麟的部队被宋哲元收编,他自己当了北平军分会高级顾问,自觉没什么意思,半年后辞职,跑到天津当起了寓公。

汤玉麟用他在热河刮地皮得来的钱,买下天津意租界二马路的一处豪宅。这是一座气势宏伟、豪华考究的意大利建筑,外部华丽壮观,楼内装饰极为考究,犹如一座光彩照人的西方官殿。除了这处豪宅之外,意租界医院小马路(今光明道29号)也有他的宅邸,法租界霞飞路的那幢楼

(今和平区花园路3号,天津市化工采购供应站),为其长子汤佐荣的私宅。他还与友人合组三义房产公司,经营惠中饭店、光明社(今光明影院)等处房产。

意租界二马路的这一豪宅,即今天我们所称的“汤玉麟旧居”,早先是吴毓麟的宅邸。吴生于1871年,天津人,在北洋水师学堂曾受到严格的重视,毕业后被保送到外国留学。归来后,历任海军练习舰教习、京榆铁路监工、邮传部帮办、海军视察等职。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他被授海军中将,继任天津大沽造船所所长、海防指挥官,兼北洋劝业铁工厂总办。1918年任交通部参事,1922年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1923年任交通总长,为直系代表人物。

1924年直系失败后,吴毓麟退居天津,住意租界二马路豪华住宅,即1922年所建的那座石基楼。关于此楼的建造有如下一说:1918年天津建

扶轮公学,该校利用铁路运输之便运来青石料盖校舍,这是天津市内第一座用石料建的楼,故而吴深知建石楼之益,在他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及交通总长时,也以其掌管铁路的有利条件,从山地运来石料,购地盖楼,于是才有了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豪华宅邸。吴毓麟在这里居住了近十年的时间。1931年他租赁了特一区12号路的一所德式洋楼,此宅才归汤玉麟所有。

这幢建筑于是便成为汤玉麟晚年隐居天津的寓所。1949年2月,汤玉麟去世。汤妾及其子女于1950年4月将此宅邸卖给天津市供销合作社,现由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使用。这座宅邸是目前天津市保存较为完好的意大利古典式建筑,已被列为天津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20世纪初期,飞机发明出来并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受此影响,中国加快了军事航空建设与发展的步伐,成立专门机构,组建海军航空兵。1929年初,为进一步加强海军航空兵建设,时任海军厦门航空处筹备员、曾先后毕业于德国陆军学校和航空学校的陈文麟奉命奔赴欧洲选购飞机。在从英国爱罗公司购得4架阿维安式双翼二座飞机,并分别命名为“厦门号”“江鹤号”“江鹞号”和“江鹏号”之后,陈文麟亲自驾驶着其中的“厦门号”与丹麦飞行员约翰逊一起于当年3月13日从英国出发,启程回国。5月12日,历经一万多公里跨越欧亚大陆的艰难飞行,“厦门号”成功飞抵厦门,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关注。借欧亚长途飞行这一“中国航空界破天荒的壮举”,陈文麟一时间名声大噪,被誉为“成功完成国际长途飞行的第一个中国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为抵御外敌入侵,增强军事国防力量,国内加强空军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航空救国”运动再次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展开。为积极响应和进一步宣传“航空救国”主张,1933年7月25日,陈文麟携潘鼎新驾驶着有“国产第一号”之称的“江鹤号”飞机从厦门起飞,正式开启“经福州、温州、杭州、南京、上海往北平、天津、济南”的环飞中国之旅。一路上,陈文麟一行公开发表演说,进行飞行表演,宣传“航空救国”思想,所到之处无不掀起航空救国的热潮。

1933年9月26日上午11时10分,陈文麟与潘鼎新驾驶飞机从济南飞赴天津。途中,因受风暴影响,原计划两个小时的航程足足延迟了1个小时,直到当天下午2时左右,“江鹤号”才终于飞抵天津东局子机场上空。此时的东局子机场,已聚集了来自各界百余人,他们高举着欢迎旗帜,翘首以盼。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银灰色的“江鹤号”在机场上空盘旋片刻后平稳降落在机场跑道,陈文麟与潘鼎新相继下机,现场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下午6时,当时的天津市政府在六国饭店设宴款待陈文麟与潘鼎新二人。在宴席上,陈文麟致辞表达谢意,并表述此次环飞全国之旅的目的乃是“使国人知吾国已能自造飞机,以唤起国民对航空之兴趣”。其后,陈文麟又代潘鼎新讲演“江鹤号”的自主研发过程,引得众口称赞。

在津停留期间,陈文麟与潘鼎新接受各界邀请,发表了数次演讲。27日上午,陈文麟一行前往大礼堂出席欢迎大会并进行演讲,宣称“航空救国实为目前切要之图”“航空不仅在军事上占重要地位,于民众之关系亦极端重要”,因此,“欲图航空救国,必须航空民众化”“提倡人民自造飞机”,号召“民众方面自起倡办,如全国每人年出一元,即可购置飞机四架,遇有需要,即可贡献国防;即在承平时代,亦可便利交通,调剂文化科学,提高内地知识”。下午2时,东局子机场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广大之机场,已被观众占满北半部;汽车排列场中,约长半里”。2时,陈文麟和潘鼎新离津前的飞行技术表演正式开始。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表演中,陈文麟驾驶着“江鹤号”飞机在机场上空时而急升而上,时而急速下降,时而急剧回旋,时而加速直航,时而掠地飞行,时而倾斜前进,高难度动作不断,引发现场观众惊呼感叹,热烈赞美,掌声不绝于耳。3时左右,在结束了这场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后,“江鹤号”载着陈文麟与潘鼎新向北平飞去,继续完成他们的环飞中国之旅。

“陈潘所驾飞机为吾国自制之飞机中比较成功之第一个,树吾国自制飞机之楷模,作航国之倡导,饶有深长之用意,非普通游历飞行可比。”正因为如此,陈文麟与潘鼎新的这一次天津之行,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他们慷慨激昂的讲演和精彩纷呈的飞行特技,给广大民众带来直观上的感受、视听上的冲击,进一步提升了民众对航空救国思想的认知,增强了民众对国产飞机的信心,由此掀起了天津捐机献机运动热潮,推动了“天津”号飞机捐筹委会的成立,呈现在天津“提倡航空事业之声浪,更引起民众对自造飞机运动之兴趣”。当时有媒体不禁赞道:“因为‘航空救国’运动这样深入民间,民族的生机来了!”

中国国际长途飞行第一人的天津之行

王敏

